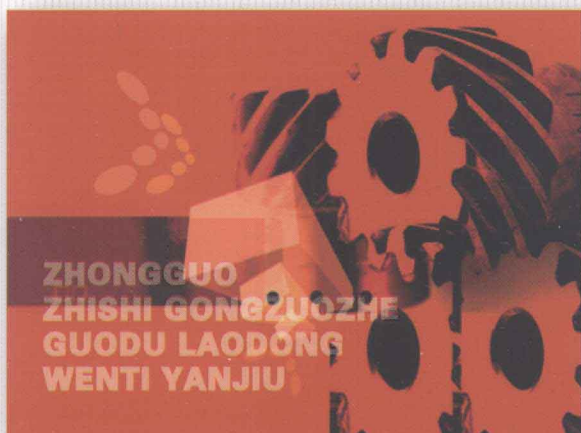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博士论文文库

国家重点学科——劳动经济学支持项目

国网能源研究院人力资源管理专著



中国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 问题研究

● 王丹/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中国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问题研究



中国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 问题研究

作者姓名

出版年份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博士论
国家重点学科——劳动经济学支持
国网能源研究院人力资源管理专



中国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 问题研究

◎ 王丹/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问题研究/王丹著.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1. 1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博士论文文库)

ISBN 978 - 7 - 5638 - 1948 - 5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知识分子—疲劳(生理)—评定—研究—中国
IV. ①R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4750 号

中国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问题研究

王 丹 著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 刷 北京大华山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980 毫米 1/16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2.75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38 - 1948 - 5/R · 10

定 价 26.00 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博士论文文库》的出版是学校发展、学科发展及人才培养的盛举。述其作用论其特点，必须回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予以说明。

一

众所周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北京经济学院）是我国第一个劳动科学教研基地，至今已有55年的历史，假如是个自然人，当此年龄段该是知天命多时了。五十五个年头，它有过创业的艰辛，有过成功的喜悦，有过挫折的郁闷，有过耀眼的光环。它出身高贵，幼年受宠，少年惨遭磨难，青年恰逢盛世。从纵向看，大致可切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北京劳动干部学校阶段（1954～1958年）

1954年，正值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之年，中央和地方经济建设如火如荼，需要大批经济管理特别是劳动管理干部；在职劳动人事干部大都是复员转业军人，需要大力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李立三同志和马文瑞同志的关怀下，中央批准建立北京劳动干部学校。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1955年11月11日写给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信函指出：“为提高各级劳动干部的政治和业务水平，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曾经前中央财委1954年9月6日批准建立一所容纳500名学员的劳动干部学校……”经中央1954年9月批准后，北京劳动干部学校和北京试验技工学校开始筹建。在北京市东郊红庙征用了近百亩土地，建起了教学楼、礼堂、食堂、校办工厂厂房、教工及学生宿舍等。陈达、袁方、任扶善等一批教师从人大劳动专修科（劳动专修科宣布停办）调进了劳动干校。在建设校园的同时，劳动经济、劳动保护和锅炉检验三个专业开始从全国劳动管理干部中招生。作为大专性质的“调干生”，学制为一年。1956年2月，三个专业的500名学员已经坐在新落成的教室里正式开始上课了。

令人骄傲和永远不能忘怀的是，1957年1月，正当第一批学员即将毕业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的领导，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全校师生员工。劳动经济专业的老师和劳动干校的领导等同几百名学员一起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接见。至今我们还保留并在劳动经济学院走廊里悬挂着这张巨幅照片。

1957年和1958年,劳动干校又陆续在全国各地招收了两届学员。这些学员毕业后回到原单位,大大加强了劳动管理工作,成为骨干力量。他们之中的佼佼者被提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任职。

第二阶段:北京劳动学院阶段(1958~1962年)

1958年在“大跃进”中,北京劳动学院在北京劳动干部学校的基础上成立。学院设有四个系,即劳动经济系、劳动保护系、机械系和动力系。1959年开始在全国各地、通过高考正式录取学生。劳动经济系从北京、天津、河北省等地招收了40名学生。1960年劳动经济系继续在全国招生,为经02班。1962年院系调整,从机械系、动力系中又调过一些学生,组成经03班。这两个班的学生像第一届学生一样,政治思想水平高,学习能力强,同学团结友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毕业后这些学生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很快成为劳动人事部门、政府其他部门和一些院校、研究机构的骨干。

第三阶段,北京经济学院阶段(1963~1974年)

在三年困难时期,国家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劳动学院进行调整,将机械系和动力系调到北京机械学院,保留劳动经济系和劳动保护系。当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以后,1963年在刘少奇主席关怀下,劳动部将劳动学院交给物资部领导,并设置了物资管理系,学院遂改名为“北京经济学院”,由郭沫若副委员长题写校名。

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较快发展的时期,教育事业此时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在此时期发展更为迅速:1963年在全国招了一个班;1964年招了两个班;1965年招了两个班。到1965年秋季,劳动经济系在校学生已达近200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第四阶段:新北京经济学院阶段(1974~1994年)

“十年动乱”中断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经济学院和劳动经济系也在所难免。1974年,经受了动乱之苦和“五七干校”艰苦锻炼后的北京高校教职员返回北京。北京市教委决定,将原北京经济学院、原人民大学四个管理系、原北京市工商管理专科学校合并成立了新的经济学院,仍命名为“北京经济学院”,并请陈云同志题写了校名。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1977年全国恢复了高考。高等教育的春天来到了,北京经济学院及其劳动经济系从此走上了新的征程,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发展。

劳动经济系1977年、1978年每年都招收两个班的本科生,以后每年招收一个班。同时,开始了多层次办学。1979年,在全国第一批招收硕士研究生,1981年获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从1985年开始,劳动经济系在北京、杭

州、宁波、乌鲁木齐、太原、石家庄、唐山、长沙、银川、贵阳、南宁、桂林等十余个城市，招收函授生。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函授生多达3000余人。1985年，劳动经济系又开创性地在杭州举办了“全国首届劳动经济师资格研究班”，在全国各大专院校和一些大企业招收100余名学员。这些学员毕业后都成为相关院校的劳动经济、人力资源专业骨干教师或领导人。从1987年起，劳动经济系又同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该院1985年建立）合作，在全国举办劳动经济专业高级研修班（类似于90年代的在职研究生课程班），招收学员3000余名。

改革开放后招收的几届学生，由于多是“文革”中的“老三届”，基础扎实又经过几年甚至十来年的下乡、进厂、下矿的艰苦磨炼，再加上年龄较大，所以学习都非常刻苦，涌现出的优秀分子更多。后来有50余名毕业生担任副局级以上职务或被评为教授、研究员，考取博士的多达30余人。

第五阶段：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阶段（1994~2008年）

根据北京市教委决定，原北京经济学院和原北京财贸学院于1995年合并，成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从此，劳动经济系以及后来于2000年由原劳动经济系与原人口研究所合并成立的劳动经济学院，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一是1994年在原劳动人事专业基础上开办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二是1998年由原来的劳动经济专业演变成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三是从1997年开始招收人力资源在职研究生，每年招收几百人；四是2000年劳动经济专业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社会保障专业获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2002年劳动经济专业获得批准成为北京市首批重点学科之一；2003年获批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同年创办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劳动关系方向；2004年创办国际人力资源专业方向；2006年创办了劳动关系专业。五是2007年劳动经济学获批成为国家重点学科；2007年劳动经济学免答辩成为北京市优秀重点学科；六是2008年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获批成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和北京市特色专业，社会保障专业获批成为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

目前，劳动经济学院办学层次丰富。设有博士点一个（劳动经济）、硕士点四个（劳动经济、社会保障、人口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本科专业四个（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社会工作、劳动关系），本科专业方向一个（国际人力资源），以及专升本，研究生课程班，设有三个系、六个研究所，一个国家级核心刊物《人口与经济》杂志编辑部，一个图书情报中心，一个人力资源测评中心。本科生由原来每年招收一个班发展成为每年招收5个班，硕士研究生每年招收60余人，博士生每年招收10余人。同时与美国、日本、英国、荷兰、加拿大等国的一些大学建立了广泛联系。

劳动经济学院经过 55 年的发展,已经今非昔比。55 年来,共为国家培养输送各类学生 1 万余名,在国内同类专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目睹我院今日之盛况,我们由衷感到自豪、高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高兴之余,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差距与不足。我们要继续紧紧绷住“学科建设为发展之魂,队伍建设为发展之基”这两条学院发展的主线,不断开拓进取,迎接更大的挑战。

二

我校劳动经济学院作为我国第一个劳动科学教研基地,在努力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见证了本学科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国古代的大诗人屈原说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此句用于探寻劳动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似乎是合适的。

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是一门研究劳动的人的学问,其产生和发展是与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及劳工运动等分不开的。首先,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产生了雇佣劳动,并逐步出现在雇佣劳动条件下的劳动力供给、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等劳动经济问题。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劳资雇佣关系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此后,雇佣劳动所产生的工资、失业、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工伤事故与职业病、妇女与重工劳动、劳资谈判、罢工等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类问题不断涌现,促使经济学家对此进行深入的思考。19 世纪的美国,劳动问题日趋上升,工会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1886 年,埃利·理查德(E. Richard)出版了《美国劳工运动》一书,分析了工会在劳动力市场、劳动条件的决定方面的作用,开创了对劳动力市场现象进行制度与组织分析的先河。19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劳动力市场日趋成熟。1925 年,布卢姆(Bloom)出版了《劳动经济学》一书,这是历史上第一本以劳动经济学命名的劳动经济学教科书。该书涉及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工资、劳资关系、劳工运动、劳动立法等内容。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和世界范围内严重的失业形势,引发了经济学家对宏观劳动问题的深入思考。1936 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开创了宏观经济学。进入 40 年代不久,由于芝加哥学派发动了一场“劳动经济学革命”,重新肯定了 19 世纪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突出强调了劳动力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把劳动力市场的论述加到劳动经济学中,并且使劳动力市场成为劳动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此后,劳动经济这门科学重新受到各国学术界的重视,有了很大发展。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和劳资关系的演变,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劳动经济科学

有了进一步发展,新成立的劳动经济研究所不断出现,劳动经济学专著和教科书不断出版,论文和研究报告不断发表,呈现出持续发展的形势。总的来说,西方劳动经济学从产生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大体上经历了劳工运动、劳动问题和劳动经济几个发展阶段,并随着市场经济国家社会和经济环境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不断产生对劳动力市场分析和研究的新需求,劳动经济学的理论日益丰富。

我国劳动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最早出版的劳动经济学著作可追溯到1927年著名社会学家陈达的《劳动经济概论》和《劳动经济学》。但当时劳动经济学只是一门课程,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劳动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和专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1958年,北京劳动学院开设劳动经济本科专业,标志着我国劳动经济学专业的诞生,但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控制下的计划劳动经济体制的束缚,我国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和体系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束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城乡隔离”的劳动制度实质上已经解除,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劳动关系也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同时随着我国城镇非国有企业的劳动力队伍的壮大,对传统国有经济的非市场的“职工”的发展模式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这种挑战迫使传统的管理体制进行深层次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方向是建立以需求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适应的劳动经济体制。

综上所述,我国劳动经济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科的发展和建设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发展阶段。从劳动经济学科发展轨迹可以看出,我国劳动经济学科建设和发展不仅受经济和政治上的限制,更受到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困扰。如建国早期,有人认为劳动工作政策性强,不需要科学知识,怀疑在大学设系科培养干部的必要性。这种看法导致1952年院系调整中取消了各大学中的劳动教学组。在此以后,又有人认为劳动经济是工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有了工业经济系,就不必另设劳动经济系,这种看法导致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取消了附设的劳动专修科。在1958年北京劳动学院成立以后,又有人认为这是硬搬苏联的经验,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到了“文革”期间,更有人认为劳动经济学科“贩卖苏修黑货”,“培养修正主义苗子”,这种错误思想成为1969年北京经济学院连同劳动经济系被撤销的理由之一。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进步,劳动经济学科因其研究、解释的社会经济现象十分重要,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劳动经济专业,1986年北京物资学院、重庆工学院等院校也开设劳动经济专业。到

1998年教育部调整本科目录时,全国已有数十所大学举办劳动经济本科专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我国的国情使然,劳动经济学孕育出了发展十分迅速,受到广泛关注的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劳动关系三个本科专业。

进入21世纪,民生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劳动经济学因以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人力资源开发、职业发展等民生问题为研究领域,使其成为经济学家族中最直接紧密地与民生问题相连的经济学科,在一些情景下甚至多次被人称为“民生经济学”。面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大变革、大发展,劳动经济学科必须快速发展,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

三

改革的实践呼唤着理论指导,我国劳动经济体制改革迫切需要深化劳动经济理论的研究,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劳动经济理论和学科体系,这需要几代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坚持不懈的努力,而其中,劳动经济学专业的博士是一支重要的理论研究力量,他们应在继承老一辈劳动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改进研究方法、加快与国际同行的学术交流,促进劳动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为此,未来的劳动经济学研究应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未来的劳动经济学研究,应当在以劳动力市场为核心的基础上扩展到劳动关系、人力资源开发和劳动政策领域,以适应市场化改革的需要。劳动关系研究是市场经济中极为重要的问题,对劳动关系的研究还要应用管理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劳动经济学还应进一步扩展到人力资源开发领域,从宏观领域综合研究人口、教育、培训、就业、收入分配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劳动政策研究是政策科学的一个分支,专门研究劳动领域政策的科学,在劳动领域内,有效的充分就业、和谐的劳动关系、完善的劳动保护是各国政府劳动政策的基本目标,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是社会的主人,劳动政策更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劳动政策研究应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微观上,劳动经济学应延伸到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研究人力资源管理的方法与技术,注意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管理中的劳动问题,包括企业组织结构、企业家评价、人工成本分析、劳动安全卫生成本与收益等。在研究方法上要尽快与国际通行的研究方法对接,更多地运用实证的方法、计量的方法,力求研究成果更具实用性。同时,发展我国的劳动经济学不能闭门造车,要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

第二,未来的劳动经济学研究,应该是运用交叉学科的方法进行的研究。社会的发展,使得现代各个学科对各自的研究对象、研究规范、术语形态和学理体系之间严密界定和严格分工,使学术趋于专门化和职业化。这样的分工使得人类的知识在各个领域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深刻、透彻、条理整然的成果。分工使得韦伯早在20世纪初就感叹:“学术已经达到一个空前专门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还会一直继续下去。”这样的专业化分工使得“科学家非但不能兼容不同的科学,而且也无法占据某一科学的全部领域。他的研究只限于固定的某一领域,甚至是单独的一个问题”。这样的学术分工和壁垒森严的学科界限造就了越来越专业化学术的同时,则有可能对人类知识的完整性进行人为的阉割!因为分工越是专业,从事相应研究的学者就不得不集中更多的精力来训练他从事学术职业直接所需要的能力。这些能力越是得到强化,其他的能力越是受到损害,得到强化的这些能力就会越加局限在一种固定的形式当中,而学者本人,就会逐渐成为这种形式的奴隶。这样的学科之间的人为阉割可能还会因为学科的封闭状态、学术的近亲繁殖、“劳动学人”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共同利益而得到强化,结果往往是造成各个学科门户的株守,新的思维方式与学术方法受到压抑。当前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亦是过于流连于内部人自己编织的劳动经济学人工孤岛之上。我们迫切地需要补充新鲜的血液,不断地从这个孤岛上走出来,以便看到更多的风景。我们需要引入经济学的定量分析、管理学的实务操作、社会学的实证调查、人类学的深度个案诠释,甚至是文献计量学的引证分析等方法,而不满足于现在的概念探讨和规则制定。劳动经济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但绝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学科。我们的研究需要运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打破现有学科之间的隔阂,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布迪厄说过:“哪里突破了学科的藩篱,哪里就会取得科学的进展。”所以随着以后研究的深入,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专门化的同时,我们同时将会看到劳动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与借鉴,这将是两条并行不悖的主线。

第三,未来的劳动经济学研究,是钱穆先生所说的那种“对本国的历史怀有一种温情和敬意”的研究。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存在着对自己的历史有一种妄自菲薄的倾向,“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的两个主体,它们之间的文化比较的问题,往往被转换和扭曲为“传统与现代”的单线进化问题,中国为传统,西方为现代,对现代化的渴求使得中国之历史自然而然地处于逻辑的劣势,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在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关注中国历史,关注我们祖先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而形成的行为方式。只有对历史把握住了,才能具有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种对古

人的“了解之同情”，而不是一味地咒骂历史。

第四，未来的劳动经济研究，应该是关注中国的国情和实践的研究。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研究带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因此，我们希望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应该面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现实。英美怎么样、法德又如此的西方经验，只是解决它们的问题的知识，同样是“地方性的知识”，并不是普适的知识，并不能想当然地适用于中国。现在言必称西方的研究，过分的倚重于域外经验，自觉不自觉地吧西学要解决的西方的问题当成我们当下要解决的问题，这其中就缺乏对我们的现实和国情的把握与了解。我们的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中国的劳动实践和中国劳动经济问题，不能让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因为缺乏实证成为抽象的、空洞的，成为知识精英在书斋里的专有物品，使其堕落为脱离大众的、贵族式的、奢侈的、干瘪无味、概念游戏般的研究。

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博士点正是基于对未来劳动经济研究的企盼，对自己的博士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生从入学之日起，“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治学”，平时严格标准精心管理。学生在校期间，有繁重的读书任务、充实的课堂教学、健康多样的师生沟通渠道；还有走出校门的调查、实践和挂职锻炼等要求；培养方案中有导师组的集体训话、严格的开题环节、预答辩程序、淘汰筛选机制；最后还有非常正规的答辩程序。从取得博士点以来，我校劳动经济学博士生的质量在国内一直名列前茅。

为总结交流计，也为宣传传播计，更为争鸣批判计，我们决定出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博士论文文库》，甄选学术质量较高的劳动经济学博士论文结集出版。在文库付梓之际，有两点声明：一是博士论文文责自负；二是刊印之论文是著者在答辩之后根据答辩委员会老师的意见又进行了深度加工和文字的扩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博士论文文库》不求立言以存于后世，只愿能为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之学术振兴，尽一己绵薄之力。劳动经济学研究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愿我校劳动经济学科层楼更上，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生生不息！

学子放言贵无忌，新论迭出敢争鸣，愿此文库成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子学术探讨的阵地，思想火花迸发的源泉。

同时,也希望作者和读者与我们一起,关心、爱护这套丛书,共同办好这部文库!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会长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河清

2008年11月1日于北京朝阳校区

内容简介

我国知识工作者在社会和经济发展需求、文化导向和社会制度等外部环境,以及成就动机、个人特质和群体特征等内在原因的共同作用下,自主或被动地提供了超时、超强度的劳动,使得原本适度的劳动行为转变为过度劳动行为,从而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不仅给用人单位带来不利影响,也直接表现为劳动者出现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征等身心失谐的状况,极端情况下会出现“过劳死”;所以,国家应予以必要的关注和政策干预,以促进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和谐、持续、健康发展。

本书在系统梳理国内外过度劳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过度劳动的内涵及其三个构成要件。以此为基点,构建了过度劳动的评定体系,包含劳动者的疲劳状态和工作状态两大维度。其中,疲劳状态的表现和测量划分为躯体症状、精神症状和神经感觉症状三个方面;工作状态的评定划分为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两大方面。根据上述两大维度和五大方面构建过度劳动的评定指标体系,通过设计过度劳动测量量表,并参考日本劳动者疲劳积蓄度测评量表的设定标准建立了过度劳动的评定等级。

本书从理论层面剖析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的根源和实质,在此基础上,将知识工作者的群体特征、用人单位的管理理念和激励措施、知识工作者个体差异等归结为过度劳动的直接原因,并从社会文化、社会经济、社会制度等层面剖析过度劳动的深层次原因。以理论上的思辨探讨为基础,结合北京地区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原因的实证研究,构建了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的形成机制模型,以此打开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问题发生、发展的“黑箱”。

由于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因而针对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的预防与干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采取综合的、政策性和组织性的战略与策略进行体系化应对。本书结合我国的国情特点,建立了“三层过度劳动对策模型”,倡导国家(社会)、用人单位和知识工作者个人三者分别从过度劳动的预防、应对和后果处理等三个层面动态结合,分层次、分类别地共同应对过度劳动这一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

重视过度劳动问题，可持续地开发人力资源

(代序)

最早知道“过劳死”一词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候正在上大学，在一些报道上看到在日本存在“过劳死”的现象，当时只留下了日本人工作“玩命”的印象，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事情会跟中国人扯上关系。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过劳死”的现象却越来越多地开始在中国的劳动者当中出现，最早见报的是一些科研人员因工作强度过大等原因而英年早逝；接着是一批事业正如日中天的企业家在几乎没有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过世；再接着，又几次爆出在高科技企业、咨询公司等企业工作的一些白领员工年纪轻轻就倒在工作岗位上的消息。

尽管真正走到因工作劳累过度而离世这种地步的劳动者人数并不算多，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中国当前正在经历的这种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工作压力大、工作强度高以及劳动者自身的健康知识和健康意识不够等多方面的因素，已经使我国的很多劳动者处于“过度劳动”的状态。这种状态若得不到关注，长期性持续存在，一方面会对中国劳动者个人的身心健康带来重大损害，影响到其家庭的和谐幸福；另一方面，也会对我国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尤其是各类稀缺人才的利用产生不利影响，导致经济中的人力资本收益率下降。因此，加强对过度劳动问题的研究，了解过度劳动在当今社会存在的广度和深度，分析过度劳动的成因，对过度劳动进行量化评估和比较，进而探讨如何才能避免过度劳动可能造成的各种伤害，防止过度劳动的出现，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到目前为止，过度劳动问题不仅没有引起社会的重视，理论界的研究也并不多见，综合性的研究更少见。过度劳动问题的研究之所以不简单，因为这一问题并不只是属于某一学科领域，它实际上涉及病理学、心理学、

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甚至法学等多个学科范畴,因而需要进行多视角的研究。王丹博士在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领域是劳动经济学,有着较为扎实的经济学功底,同时又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拥有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因而敏感地意识到过度劳动问题是一个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并将此确定为自己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最终形成了这本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专著《中国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问题研究》。在这部专著中,王丹博士系统地搜集、整理了关于过度劳动问题的各学科领域的理论和研究成果,界定了过度劳动的概念及其内涵,构建了对过度劳动进行评定的量表,同时以北京市知识工作者为样本,对知识工作者的过度劳动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调查、评估,并进行了相应的量化研究。最后,作者从过度劳动的预防、应对和处理三个层面,提出了如何从国家及社会、用人单位以及知识工作者三个方面,重视和应对知识工作者的过度劳动问题。这项研究成果是对我国的过度劳动问题进行的一项综合性、探索性研究,对于我们了解、认识以及重视转轨时期中国劳动者尤其是知识工作者的过度劳动现象具有较高的价值。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处于经济增长和转型过程之中的发展中国家可能要比发达国家付出更高的代价,但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想保持持续增长,必须妥善处理好各类资源的使用,而不能是集中式、浪费性地使用资源,而在这些资源中不仅包括各类自然资源、环境资源等,同时也包括人力资源。在一个较短的时期中过度使用劳动,不仅会使劳动者在短期中产生的边际生产率较低,而且还会缩短劳动的价值创造周期。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告诉我们,这种投资与其他投资在基本原理上是相同的,在投资成本一定的情况下,为了确保投资之后取得较高的收益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使投资之后的收益时间尽可能延长。因而,国家、用人单位以及劳动者个人都应当明白这样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在实践中充分认识到过度劳动的危害。国家应通过相互政策干预甚至立法的形式来防止过度劳动对劳动者所造成的伤害,用人单位则应努力通过恰当的工作设计、合理的工作量安排以及其他的各种计划来避免使员工处于过度劳动状态,不断提高员工的工作

生活质量,而劳动者个人也要了解过度劳动的可能症状及其可能产生的危害,积极预防或缓解过度劳动可能会给自己及其家庭带来的各种不良后果,实现工作和生活之间的良好平衡。

刘昕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助理
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